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2008-2009)

(第8辑)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报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编
主编 / 黄卫平 汪永成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第8辑)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编

黄卫平 汪永成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第 8 辑/黄卫华, 汪永成主编;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97 - 1999 - 2

I. ①当… II. ①黄… ②汪…③深… III. ①政治改革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939 号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第 8 辑)

编 者 /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主 编 / 黄卫平 汪永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李 响

责任校对 / 张永琴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31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99 - 2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经典文献学习

政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与实践机制

——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林尚立 / 3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义

——纪念《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发表三十周年 黄卫平 李嘉兴 / 12

中国政治发展

以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地方政治发展

——深圳南山区基层党建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杨海蛟 林 毅 / 25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的思考：一种比较的视角 李路曲 / 44

体制转型的模式、初期条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型 唐 亮 / 61

融和主义：中国民主模式的本质特征

——兼论中国民主模式与西方代议制的关系 刘熙瑞 / 76

革命性族际政治整合的反思 常士闯 / 83

对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杨可明 / 92

地方公共治理

近年来中国地方治理创新的趋势特点与未来展望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 马宝成 / 109

政治功能的开发与中国经济特区的前途	汪永成 黄卫平 / 124
探索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成都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郑浩生 / 136
中国地方公共治理中的网络媒介事件研究：现状评估与	
意义展望	师曾志 / 144
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演变的实证分析：基于深圳	
52 个样本的研究	张 涛 / 164
生态环境因素与小区业主集体抗争	
——对上海 15 个小区的实证考察	王 瑾 马卫红 / 185
农业税费减免政策与村民自治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上海市 Z 镇 8 村的调查	郑晓华 杨国贤 / 201

选举政治

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探索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对四川省新都区、船山区和平昌县探索的比较分析	
.....	王 鹏 / 227
选举机制开发与党内民主创新	
——以深圳光明新区公推直选党代表为个案	陈家喜 / 241
党代表任期制与两新组织公推直选市党代表	
——以创维集团和律师协会为个案	刘 娅 / 250

港澳政治与行政

香港特区政治发展的逻辑及未来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张定淮 孟 东 / 263
社会资本与腐败治理：以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为例的分析	
.....	白 锐 李 莹 / 274

经典文献学习

政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组织基础与实践机制

——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林尚立^{*}

摘 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党学习机制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处在时代前沿、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机理。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学习，将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全面提升党的组织质量和领导能力。在新的执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重塑政党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这对创新党的建设、提升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政党学习，不仅是党的建设战略，同时也应该是国家建设战略。

关键词：政党学习 学习型政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有传统的政党，其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其传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建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这种信仰和传统，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处在时代的前沿和中国的核心，保持生机活力。使这种信仰和传统得以确立的机制是学习。这种机制不是确立于今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形成。实践表明，这种机制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品格的先进政党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

^{*} 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的研究。

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载体和实践主体。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从改造学风入手，通过塑造新学风，塑造新党风，建构新体制，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天，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领导中国人民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完成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命，重塑政党学习，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创新党的建设，提升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时代不同了，但党的使命依旧，党的信仰和传统依然是维系党的根本，所以，当年的实践和探索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今天重读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出发点。重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学习，将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全面提升党的组织质量和领导能力。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受两大力量的深刻影响：一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二是马克思主义。前者使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后者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大力量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都借助了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并通过相关的载体作用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作用中国发展的载体主要就是政党。历史实践表明，这两大力量作用在中国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不仅取决于这两大力量本身的强度和作用途径，而且也取决于被作用的中国这个主体对这两大力量的认识与把握。中国主体对这两大力量的认识与把握状况，直接决定中国在哪一层面上，以什么样的姿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战略与这两大力量形成有效的互动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体的历史实践表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论是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把握，都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甚至是错误，从而导致实践中的挫折和困难。当然，这些偏差和错误客观上还是为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近代中国开始接触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从其所经历的思想运动历程来看，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把握；同样，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到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对现代化运动的把握，

更多的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的认识与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更多地给予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与把握。虽然理论上一直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就接受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是，从人的思想认识运动的内在逻辑来看，接受是一回事，真正把握并科学地运用于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主体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对现代化所展现的人类历史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入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中国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就赋予了现代化以新的理想追求：通过现代化发展，实现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于是，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现代化以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同时，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也就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实践作为自身实践运动的理想基础与政治基础。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力量展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因而，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实践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在这里，政党、国家、人民及其所组成的社会，具有高度内在统一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影响政党自身的同时，也通过政党影响到整个国家及具体承担国家建设的广大人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与理想使命，而且塑造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取向与价值结构，进而也塑造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思想方式。所以，不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把握，直接决定着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成败，决定着其所领导的国家发展的成败。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追求发展和解放的必然成果。它们首先出现在西方，开启了人类追求发展和解放的新境界，解释了人类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必然趋势。正因为它们共同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所以，很自然地会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走出西方世界，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以启发其他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必然性并非其现实社会内在逻辑的必然，而仅仅是

其现实社会融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而面临的必然性。因而，对于这些社会来说，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及它们共同体现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是外在的，是一种客体化存在。固然，这些地区的国家可以为追求这种客体化的存在而努力，但实践表明，如果不能将这种客体化存在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基于主体的内在逻辑而形成的自觉的、合理的发展行动，那么，不论这个社会多么努力，都无法真正找到通往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

所以，不论是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将其内化为主体从自身逻辑出发所形成的思想、战略与行动。在这种内在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塑造至关重要，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如何科学地改变中国现实及中国的现实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正确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有中国化问题，即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也有中国化问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又能够有效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的过程。

正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一样，中国的进步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与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要有效指导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必须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不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本质上是一体的，其使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能够指导中国进步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使该体系既能维护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合法性，又能为有效促进进步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理论。换句话说，中国虽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用于具体指导中国进步与发展实践的理论与思想，却是自我创造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与理论的自主创造，是自主创造的思想与理论的有效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的过程，而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这其中，主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具体来说，就是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其行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三点：首先，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而进入中国实践；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结合，以推动中国的实践；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践的能力与水平直接决定于它创造这种结合的能力与水平。

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取决于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与水平；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能力与水平，即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与水平。中国共产党形成这个能力的基础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与把握；其二是对中国国情与现实实践活动的认识与把握；其三是将基本原则与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能力。显然，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且相互决定，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其他方面，从而最终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能力与理论实践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使命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能够在中国社会创造实质性的进步与发展。这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得以有效实践并创造实际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实践程度直接决定着其在理论上的建构能力与发展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与水平所基于的上述三方面基础，不仅是对党的理论家的要求，而且是对整个政党的要求。政党的整体实践是党的理论家提炼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现实基础，这正如毛泽东所言，理论来源于群众的广泛探索和实践。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党的组织质量与实践能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与实践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理论要掌握群众才有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理论掌握群众，固然与理论本身的科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5页。

学性有关系，但也与作为理论的创造与实践载体的政党组织有关。在党的组织无法赢得群众认同和信任的情况下，党所创造和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很难大众化。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项简单的理论建设过程，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过程，理论建设寓于其中。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建设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贯通的。从党领导人民实践的角度看，党风建设对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具有全面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① 为了形成正派的党的作风，在1941年前后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反对宗派主义的党风与反对党八股的文风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其中把学风建设置于首要任务。毛泽东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②

四 政党学习：方法与制度

从人的思想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角度看，学习的过程是知识积累与知识创造的有机统一。这个过程，既是学习主体吸收和掌握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将知识内化为主体的思想和认识，以提高主体的现实生存与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现实感受与实践与其所接受的知识将形成直接的交互作用，主体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驾驭和把握，直接决定着主体的学习能力、学习效率与学习成效，进而决定主体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与水平。人的学习过程是如此，同样，政党的学习过程也是如此。学风问题由此而起。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2页。

②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3页。

理论过程中，学风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观主义。

对于主观主义态度的表现，毛泽东概括为三大表现：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具体说明道：“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样的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① 毛泽东认为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正是这种主观主义学风，“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互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②

为此，毛泽东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出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我们的学习必须建立在三大基础之上：其一，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不仅国内的，而且是国际的；其二，要研究历史，要对中国的历史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在历史中认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认识所处的现实；其三，结合实践的需要，学习国际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为了将政党的学习建立在这三大基础之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创造了三大学习制度：一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结合国际的经验与世界的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制度。在毛泽东看来，研究中国事务与研究国际事务具有同等的必要性。当年，他在痛感中国共产党在这两方面研究不足的时候，主张中国共产党在研究中国事务的时候，应该充分研究苏联这个典型，从中领会“我们在中国应该如何地工作”。^③ 二是走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的调查制度。毛泽东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9页。

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6页。

③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3页。

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 三是向群众学习，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学习实践制度，强调群众的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真知的来源。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心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

上述的一大原则、三大基础与三大制度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实践机制。这个实践机制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主体与机制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主体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机制的成效；而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主体质量的提升也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五 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承载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与实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与实践，即包含党的理论家思想与理论的行动，更包含全党在实际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因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质量、领导水平以及实践能力，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与水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创造和实践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学风。从政党学习的方法与制度来看，科学学风的建设，将直接触及党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触及党组织原则与活动方式，因而，对党的建设具有全局性的作用与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过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1页。

②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99页。

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制度建设不断得到自我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决定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学习是政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最基本途径。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根本，就是如何使学习成为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之道，而这一切都应该从学风建设开始。学风建设是基础，也是根本，其核心就是：面向科学、面向实践、面向群众。

政党学习，既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与领导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战略部署，时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政党学习，不仅是党的建设战略，同时也应该是国家建设战略。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义

——纪念《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三十周年

黄卫平 李嘉兴*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存在着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由此而导致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家长制现象等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并引发或诱发了一系列党的政治斗争。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废除了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之后，通过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持续不断地努力，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最高权力“渐进式依次移交”制度，保障了我国最高权力的平稳移交，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法治化。

关键词：终身制 任期制 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而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从此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长期以来，中国

*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研究；李嘉兴，深圳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27页。

改革决策层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的实际情况，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为了适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不断，这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再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建设日益推进，基层民主逐步扩大，党内民主不断进步，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希望并始终抱有期待，而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应对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有效性，极大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而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成就中，由邓小平亲自倡导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废除事实上存在过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尤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如邓小平所述，“是保证了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①，而且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保证党和国家高层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长治久安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体制机制。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1954年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②，还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③，无论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所谓“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④，还是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21页。

②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③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

④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